

01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冯绍雷 徐凤林 主编

强力抗恶论

伊万
(Ива)
张桂娜 译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й

上海三联书店

强力抗恶论

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 著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

◎ 译者：王海燕

•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力抗恶论/(俄)伊里因(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著;张桂娜译.

书名原文: 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уо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冯绍雷,徐凤林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2

ISBN 978 - 7 - 5426 - 3921 - 9

I . ①强… II . ①伊… ②张… III . ①历史思想—研究—俄罗斯

IV . ①D75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6593 号

强力抗恶论

作 者 / 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

译 者 / 张桂娜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5.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921 - 9/C · 442

定 价 / 38.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510725

总 序

俄罗斯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

俄罗斯的丰厚历史积累与社会思想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尽管俄罗斯并没有过犹如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以及中国等四大古代文明地区那样的悠久历史，但是它以其丰富多样而又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千年历史及其文化创造，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份宝贵财富。虽然俄罗斯也没有如同古典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那样成熟的制度构建和充裕的物质财富，但是它以其特立独行的现代化样式，为后人留下回味无穷的历史教益。人们可以说，俄罗斯在当今世界也不同于前苏联时期那样，并不具有主导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但是它观察和参与国际事务的独特视角与行为方式，以及在当今世界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依然是值得所有国家和民族加以关注、发展与之交往，共同来推动和平与进步。

一、值得关注的俄罗斯现象

俄国历史与思想，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过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知识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当下正在出现对于俄国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学术兴趣和专家队伍的重新集结。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俄国的历史性成就和富于张力的创新思想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产生过重大的激励。50年代新中国初创

时期,俄国的历史榜样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具有垄断性的影响。甚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百业待兴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家们依然“在内部”从 60 年代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虽然当时中国和苏联相互之间还不能够以“社会主义国家”相称。

如果不是上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前苏联解体和艰难转型的痛苦过程给中国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恐怕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还未必一定会以目前的态势与进程呈现于世。在这一过程当中,人们不仅关注物质性的政治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尤其注意探究俄苏思想家们在现实客观过程背后的深层思索与拷问。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在介绍和引进这一内容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欧美的思想与学术文化如何依然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历史与思想文化都会经久不断地在中国留存其巨大的影响。

到了 90 年代中期之后,时来运转。中俄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特别是新世纪之初,普京治理之下俄罗斯国力的逐渐恢复,使俄罗斯形象重新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和决策界的影响得以拓展。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量关于俄罗斯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题材吸引了中国的研究家们和普通民众。从历史档案中大量新史料的发掘,直到一系列俄国经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从俄罗斯当前政治经济发展的走向,直到其背后深层动因的剖析。俄国现象始终牵动着中国人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进展是,国际学界对于俄国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于俄国历史与思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点。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随着对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且,即使是对当代问题的探讨中,国际学术界也表现出对于现象背后的文化和思想动因的探索热情。在这样经久不衰的国际学术努力的进程中,对于多学科交织之下的新方法、新观念也层出不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俄罗斯文史研究领域中,传统上西方语境独领风骚的局面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来自俄

罗斯本身和东方世界的俄国文史研究也正在努力做出越来越多的奉献。

与上述现象相关的是新世纪俄罗斯学术界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不断进取。近年来,俄罗斯学术思想界的一系列新作本身揭示了俄国历史和思想在当代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首先,新世纪以来,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历史研究领域一系列重要著作的问世,既有若干通史类的大部巨制,也有专题类的深入开掘,这一大批作品的涌现,其特点是既不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一家独唱,垄断言路;同时,也不像上世纪90年代激进自由化时期对于前苏联历史的彻底颠覆和否定,而是对于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人物提出较为客观公允、避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评价,这在20世纪俄国历史研究中是并不多见的现象。同时,俄国思想界的活跃程度也值得注目,不仅是对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重新探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而且自新世纪以来,既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与批判,又有着对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的全面总结和前瞻。在当下俄罗斯,一个既是五彩纷呈的多样化、但同时又倾向于包容和稳健践行的思想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的思想界不无教益。

上述这些现象表明,无论俄罗斯目前转型进程行进到何等地步,俄罗斯人对于历史和社会思想问题的探索始终在吸引世人的关注。这就是本项翻译工程之所以确立的一个初衷。

二、为什么要强调对于俄国历史和思想的研究?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正迅速发展的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方面是商品、技术、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地区和文明单位依靠其优势地位的价值与观念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在追求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总的前提之下,对于文明多样性的确立和尊重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各国和各种文明相互之间的自主学习与相互借鉴,也有利于世界的和谐发展。而对于俄国历史和思想的研究,显然将非常有利于取得对于文明多样性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俄国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深刻背景乃在于,它是在东西方结合部的背景之下得以成长发展的一个国家。这种结合部文明的特征,在总体上,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是在斯拉夫原始文化为主干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广为吸收欧洲及其他文明形态,形成了一种既有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与抽象思维,又有东方式的内省文化与神秘主义,既引进欧洲式的商品形态,促使了社会分工,但又处于中央政权控制引发之下的独特文明形态;从动态的角度而言,这种结合部文化在总体上以“慢一拍”的节奏,同时又是在多种社会形态相互交叉、混合发展的形式之下紧随近代欧洲工业文明向前推进;但是,在若干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段,俄罗斯的结合部形态又会以多年积聚的能量,向旧世界进行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和扫荡,以其多领域的革命性改造而彪炳显赫于世。

深寓于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独特理念,以及其所倚赖的独一无二的客观物质空间与条件是其本身发展的深刻动因,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内在制约性之所在。这些在学术研究中通常被解释为“例外”的历史进程,恰恰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逻辑。搞清了这一点,将有利于认识俄国历史作为文明多样性发展的一个历史范例,也有利于对于当今世界历史一般性和多样化互相交织的进程的理解。

对于多样化文明的确认,离不开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解。事实上,研究俄国,也就是研究多样化文明背景下的现代化问题。

因为,俄国历史提供的是一个独特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案例,对于这一历史的洞察与把握有利于对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全面认知。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乃是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孜孜不倦求索的目标。俄国乃是一个以其四百多年坚韧不拔地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努力学习而独居于世的国家。四百年来的求索过程中,既有彼得大帝式的,包括斯大林式的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亚历山大二世式的,包括戈尔巴乔夫式的以体制自我改革为主要方向的历史进程,甚至于有学者认为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反现代性”。如何认识俄国

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丰富复杂性,乃至于绝然背反的多面性,这历来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但也正是这个难题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自身悖论。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多民族文化特性、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发展水平不一、国情复杂的大国,对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对于中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中国与俄国的既相近似、又相分殊的现代化过程尤其集中在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复杂内容的理解之中。而恰恰是对于俄国的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提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推进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进行转型的重要参照与借鉴。特别是当下中俄都面临着艰难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代人总应该提交一代人自己的历史答卷。

在体制转型的进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长、苏联在制度转型进程中的砰然崩溃,以及而后俄罗斯在 90 年代继续转型中的挫折,提供了对照鲜明的不同的转型案例。但是,近来的研究中被再三提到的问题是中俄改革进程的成败差异是否仅在于改革路径的激进与稳健之分,是否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经验与背景值得汲取。比如,一再为西方史学家所提到的,俄国作为一个产权观念先天基因缺乏的民族,是否就不可能更多地推动现代产权体制;一个由扩张所形成的多民族聚合体,是否就仅合宜于使用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办法,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本项研究的政治与学术意义之所在,而且,显然对于一个同样缺乏所谓“现代化基因”的中华民族来说,俄国的动静起落,可以作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与上述内容有关,深化对于俄国整个历史过程与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是理解“苏联解体”这一“世纪难题”的突破口所在。

为什么一个曾经在几十年中称雄于世的超级大国——苏联,却在瞬间分崩离析?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曾经是过去二十年中各个学术界别和政治理论意识形态所热议的话题。当人们知晓罗马帝国的崩溃曾经是

千年亘古的历史难题之际，就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也将长期留存。目前，并不缺乏从传统体制角度对于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似乎也并不少见从现代化角度对于苏联解体的探讨——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是“现代化过度”，而有的反而认为是“现代化不足”，然而，从深层次将苏联解体问题与其思想趋向和历史发展背景做有机的联系，仍然是一个相对不足的研究领域。此外，苏联解体究竟是一个主要由内生而外的突变过程，还是主要由外部环境的激发所致；究竟是完全可以给予理性解释的历史问题，还是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言，这纯粹是历史偶然性所致。

总之，通过俄国历史和思想路线问题的分析，应能给予苏联解体这一复杂的思想与历史现象提供更多的史实与论据。

除了上述分析的理论与政治意义而外，中国读者不言而喻地需要有与中国国际学术地位相当的对于俄国历史与思想研究作品，这是中国学人社会与心智发展水平的客观体现，也是事关中国学人是否能够自立于国际先进学术之林的需求之体现。

以上各项，皆为当代条件下为何强调研究俄国历史和思想的必要性的理由之所在。

三、历史与思想研究的特殊功能：预见

从一个比较实用的角度来看，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功能，乃是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的预判。

在一个愈益全球化、同时也愈益多样化的转型中世界，正当一切以往的规则、信念、秩序、制度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当一切物质和精神发展的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无法估量的时候，人们前所未见地感受到，对于将来变故的那种知识缺失，以及应对方面的缺乏保障。

在这样的时候，对于未来的预见，特别是对于国家发展和国际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见，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知识领域。遗憾的是，越是当人们需要这样和那样的可靠的预测知识的时候，人们越是发现，这一知识领域的

积累居然是那样的贫乏苍白。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变迁的对照之下，大量形成于以往时代的现成结论，正在变得如此的不合时宜。包括来自于经典作品的大量结论，也正在前所未见地经受时间的考验。同时，以往用于进行预见的方法和工具也都在接受挑战。

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如果无法提供用于进行有效预见的知识、工具、思想方法以及理论范畴，那么，很显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包括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取向，势将面临灾难与混乱。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自然寄希望于求助科学和人文的积累。而对于科学和人文这两者而言，最为重要的载体，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特别是人类的思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不光是一个以往积累的经验性的承继，而且，也往往是非经验性的人类良知的孕育和成熟的漫长过程。

问题在于，历史是否能够提供这样对于未来发展的前瞻性知识背景呢？

西班牙著名的人文学家奥尔特加—伽赛特曾经这样说过：“说历史是不可预言的，这并不准确。有太多的预言是被以后的事实所验证了的。如果说，未来不能够为预测留下通道，那么，往后而言，当它自己变成了过去之时，往往就成为了不可理喻之事。可以确信，与先知者们正好相反，历史，是由所有关于历史的哲学所构成的。当然，所能够预见的仅仅是未来发展的一般构架，但是，要知道，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是唯一在事实上能够做到的事。”

事实上，整个的一部俄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充满了关于预见和后来实践之间的一种张力。

当年，在马克思和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之间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十分精彩的通信，就是这样的预见和实践之间的对话。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建立之后，他还是为未来俄国革命前途的预判留下了宽广的空间。因为他看来，俄国革命家不应该从他的仅仅是从英国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而引伸出一般的社会革命的理论。甚至

于马克思坚决地拒绝任何这样的理论延伸,认为这会给他带来“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带来“过多的耻辱”。马克思就是这样在他的预言和未来俄国革命的创造性发展之间划下清晰的界限。马克思的非常有保留的“预言”,恰恰是为理解俄国提供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深刻见解。

近年来,包括俄罗斯学界在内的国际学界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的关注点,包括陀氏对于政治历史问题的许多惊人的预见。早在十月革命的几十年之前,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非常担心他所处的时代将以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更加可怕得多的风暴而告终,其实,他预见到了即将出现的狂飙式的俄国革命,而正是这场风暴带来了之后的整个世纪的国际变局。

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比同时代人更早几十年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与他的关于人类统一的思想理念有关。正是在他的人类统一的思想理念基础上,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了他的构想与西欧个人主义原则的区别,他也提出了他对于卢梭、普鲁东等一系列思想家的设计的批评。这里包含了很多精彩的思想,包括对于物质主义的批评,对于排他式的制度建构的怀疑,包括对于生存竞争式的民族主义的批判。尤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历史的非理性的思想,也即,他认为,历史是前进的,但不一定是进步的思想;历史并非总是理性的,也受到大量非理性因素影响的思想;历史不能由外交来解决;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思想,对于历史的发展有着更大影响等等的精彩论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既承继了欧洲文化的熏陶,但又是特立独行的俄国,必将会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从俄国自身而言,既有着远大的抱负和使命感,但是又受到先天地缺乏推进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基因和教养的历史制约,必然会使未来的社会变革变得鲜血淋漓。

所有这些见解,显然是后人可以从陀氏思想中汲取营养而为把握未来做出铺垫。

其实,历史与思想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某种预见未来

的功能,主要的还并不在于可以搜集多少参数为预测服务,虽然这也很重要。

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历史和思想更多地是研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因此,这种研究有可能比计算性的经济学、社会学更加准确地对人类行为作出长远判断。第二,尽管历史,包括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近似的社会思想脉流及其影响、类同而又具有差异的社会结构、不断重复出现的发展逻辑以及其他种种社会演进的节律和周期性现象,深究起来还是可能通过对于各种历史和思想进程的比较和重估,从而对未来的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预判。

这就是研究俄国历史和思想的又一个实际意义之所在。

编者

2012年11月

谨以此书纪念
伊万·伊里因诞辰 130 周年

译者导言

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 1883—1954)是俄罗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法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保守主义逐渐复兴的大背景中,伊里因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作品也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复兴俄罗斯的重要精神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伊里因的政治哲学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的治国理念,把握俄罗斯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鉴于目前国内学界无论是对伊里因本人,还是他的这本代表作《强力抗恶论》,都还相当陌生,本篇导言将着重介绍一下思想家的生平和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及其影响,为读者全面了解此书及其基本思想提供一些补充性的资料。

一、伊万·伊里因的生平及其影响

1906年,伊里因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随后在导师诺夫戈罗采夫教授(П. И. Новгородцев)的推荐下留校从事科研工作。1909年,成为法律史教研室的编外副教授。1918年,他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黑格尔哲学——关于上帝和人的具体性的学说》进行答辩,因这篇论文的独创性与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赞赏,他最后被授予博士学位。学生时期,伊里因的思想曾经较为激进,后来则渐趋保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伊里因的保

守立场和不利于新生政权稳定的言论引起了苏维埃官方的高度关注，在1918年4月至1922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伊里因被契卡秘密逮捕六次，最终被驱逐出境。

1922年10月，伊里因来到德国柏林。侨居柏林伊始，他和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洛斯基、卡尔萨文等俄罗斯侨民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在荷兰基督教联盟的资金支持下创立了俄罗斯科学研究院，这实际上是开辟了俄罗斯侨民界在柏林的精神文化基地。柏林期间，他一方面在俄罗斯科学研究院从事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发表大量的公开演讲，希望将侨居在欧洲各国的俄罗斯侨民唤醒和团结起来，为俄罗斯未来的重建和复兴奠定基础；此外，在1927—1930年间，他出版和编辑了杂志《俄罗斯之钟》（Русский колокол）。纳粹上台后，盖世太保先是希望伊里因利用他的影响力在俄罗斯侨民界进行反犹宣传，后又希望他能与他们合作，为纳粹东进乌克兰提供理论服务；这些提议均被伊里因断然拒绝。因此，伊里因遭到盖世太保的报复，他们威胁俄罗斯科学研究院，迫使院方解聘了伊里因的教职；他们还直接取消了伊里因用德语和俄语发表公开演讲的权利。作为一个服务于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者，伊里因意识到，他在纳粹德国已经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空间了。1938年7月，在朋友的帮助下，伊里因潜走瑞士，并成功地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手稿和书籍。之后，伊里因一直生活在苏黎世的近郊措里孔（Цолликон），直至1954年逝世为止。

伊里因一生勤于笔耕，用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写下大约四十多本书和小册子，还有上千篇文章。主要作品有：《关于法与国家的普遍学说》（Общее учение о прав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黑格尔哲学——关于上帝和人的具体性的学说》（Философия Гегеля как учение о конкретности Бога и человека）、《哲学的宗教意义》（Религиозный смысл философии）、《强力抗恶论》（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й）、《精神复兴之路》（Путь духовно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我看生命》（Я вглядываюсь в жизнь）、《歌唱的心》（Поющее сердце）、《通往显明性之路》（Путь к очевидности）、《宗教体验的公理》

(Аксиомы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пыта)、《我们的任务》(Наши задачи)、《法律意识的实质》(О сущности правосознания)、《君主制和共和制》(О монарх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е)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既有探索纯粹哲学问题、表达其哲学观点的理论著作,也有论述政治体制、法律意识、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本质、民主制和极权主义、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理念以及俄罗斯复兴之路等社会政治问题的作品。

关于伊里因作品的价值,其全集出版者里希查教授(Ю. Т. Лисица)如此说道:“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民族思想家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的名字强有力地闯入了20世纪末的俄罗斯生活中,自然地落到有信仰的俄罗斯人的灵魂中,在俄罗斯文化人的心灵里深深扎下根。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和人民、关心自己祖国的公民,都不能不响应伊里因热情的话语,因为它像真正的学者的话语那样严谨,像有才华的哲学家的话语那样深刻,像有智慧的教育家的话语那样严厉,像真正的艺术家的话语那样形象,像优秀的修辞家的话语那样优美。”¹长居美国的俄罗斯学者波多拉茨斯(Н. П. Полторацкий)教授对伊里因的思想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在伊里因去世后曾保存着伊里因所有的手稿与著作,他对于伊里因思想的价值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假如我们认为,在将来,在伊里因的思想遗产得到充分认识和评价的时候,他会有权跻身于俄罗斯民族导师的行列,那么我们这样认为未必会是错误的。”²此外,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史家古雷加(1921—1996)曾这样说道:“我敢断言:在20世纪的俄罗斯,没有比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更清醒、更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了。”³

-
1. Ю. Т. 里希查(Ю. Т. Лисица)编著:《伊万·伊里因和俄罗斯——未发表的照片和档案资料》(Иван Ильин и Россия.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и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9. С.5.
 2. 波达拉茨基:《伊里因教授——白色运动的思想家》(Проф. Ильин — идеолог Белого Движения), <http://www.xxl3.ru/kadeti/ilyin.htm>.
 3. 阿·古雷加(Арсений Гулыга):《俄罗斯理念的创造者》(Творцы русской идеи), Москва, 2006. С.239.

学者们的希冀和预言没有落空。早在二十年前,对俄罗斯本土的人来说,伊万·伊里因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时至今日,伊里因却在俄罗斯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在当下的俄罗斯,伊里因被视为俄罗斯最有洞见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作品和思想也受到了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伊里因及其妻子远在瑞士的墓被迁至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那是专门用于安葬因政治原因而流亡海外的爱国志士与思想家的地方,与白军将领邓尼金和爱国主义思想家什梅廖夫(И. С. Шмелёв)相隔不远。2006年,俄罗斯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购得伊里因的手稿、著作和日记等档案资料,耗资六万美元,以隆重的仪式交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收藏。在此期间,伊里因的著作不断再版,《强力抗恶论》作为伊里因的重要代表作也广受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代俄罗斯哲学史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且,学界每每提起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论”时,也往往会一并提起伊里因的“强力抗恶论”,将二者看作俄罗斯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两极予以对比研究。

二、本书的基本内容

《强力抗恶论》的写作始于1924年7月,1925年7月在德国柏林出版,是伊里因被驱逐出俄罗斯后所写的第一本书,全书共有二十二章,按照伊里因本人的说法⁴,可将它划分为四个部分:

1. 清除障碍,提出问题(1—8章)

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正确地解答问题。然而,要想正确地提出问题,则需要对构成问题的那些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强制手段和暴力?这些问题正是提出“强力抗恶论”思想

4. 伊万·伊里因:《日记、书信和文件(1903—1938)》(Дневник. Письма. Документы [1903—1938]), Москва, 1999. С.138—139.